

修西底德的「西西里遠征」

◎ 劉晨光

另外一些當代讀者，從馬基雅維里的學說，聯想到了修西底德；他們在這兩個作者的身上，看到了共同的所謂「現實主義」，就是說，看到了對於神明力量的共同否認，或者對於正義力量的共同否認，以及對於嚴酷的必然性的共同敏感，與對於難以捉摸的偶然機遇的共同敏感。然而，修西底德從來都沒有質疑過高貴品第針對猥瑣品第所擁有的內在優勢，這種內在的優勢，特別在高貴者被猥瑣者所毀滅的時刻，尤其會煥發出奪目的異彩。因此，修西底德的《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史》，遂在讀者的心靈之中，激發出一種悲哀，而馬基雅維裏的著述，則從來都沒有喚起過這種悲哀。

——施特勞斯《思考馬基雅維里》，中文版，第467—468頁

無論是多麼智慧之人，要認識一個民族的底色都非得竭盡自己的心力不可。認識一個民族的底色，就是能夠看得清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古希臘偉大的歷史學家修西底德，在其大名鼎鼎的《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史》開篇不遠處說：「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和將來也會發生的類似的事件（因為人性總是人性）的人，認為我的著作還有一點益處的話，那麼，我就心滿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眾一時的嗜好，而是想垂諸永遠的。」言下之意，他就是那個看得清古希臘民族甚至一切民族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人，因為正如他所言，「人性總是人性」，不因民族不同而有太多的區別。然而，他的永恆之書記述的卻只是西元前431—404年間發生在古希臘民族內部的一次「運動」；而且，戰爭乃是人世之中最為劇烈的運動了，據他說，「這是希臘人的歷史中最大的一次騷動，同時也影響到大部分非希臘人的世界，可以說，影響到幾乎整個人類。」總而言之，他力圖使讀者相信，他描寫的是有史以來最為偉大的一場戰爭，他生活所在的是有史以來最為偉大的一個時代。在柏拉圖的《蒂邁歐篇》中，古希臘最偉大的哲人蘇格拉底承認自己沒有能力在運動中表達一個最好的城邦，而修西底德做到了，他筆下的城邦也許稱不上「最好」，但是離「最偉大」卻相去不遠。

希臘民族本身在歷史中經歷了數番激烈的變動，離修西底德最近的一次無疑是希波戰爭對於整個希臘世界的重新塑造過程，而其中影響最為深巨的又是雅典在戰爭中的崛起。正是來自東方帝國的波斯人的侵略，使希臘人不得不發展自己的海軍力量，而對此最新的歷史形勢認識最透徹的是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他斬釘截鐵並充滿智慧地說：「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一切。」在此之前，軍事上最能代表希臘民族性格的是重裝步兵，正如更早之前是騎兵一樣。據法國著名的希臘文化研究者韋爾南說，從「騎士」時代到「公民士兵」時代的轉變，標誌著希臘美德從「狂熱」到「節制」的轉變，戰勝對手、壓倒對方的欲望必須服從共同體的秩序精神。在西元前7—6世紀之間，斯巴達人開始閉關自守，堅持全民從軍的體制，

最終成為一個由重裝步兵組成的城邦。斯巴達人因其著名的淳樸尚武美德而成為希臘世界的代表：他們厭惡財富的炫耀，拒絕同外界進行任何商業或手工業的交往；他們禁用貴金屬，後來又禁止使用金銀製成的貨幣；他們停留在重要的思想潮流之外，不重視文學和藝術。但西元前550—449年之間與波斯人的外部戰爭改變了希臘世界內部的局勢。雅典自483年建立海軍以後，就在海戰中成長為一個海上民族，在打敗波斯人中發揮最重要的作用，並憑藉其超強的海軍力量在事實上取代斯巴達而成為希臘世界的頭號城邦。在這幾十年的海戰歲月中，雅典人的性格發生了關鍵的變化。後世的普魯塔克總結前人的經驗說：「海洋是民主的母親，正如父親之於兒子。」這用在雅典人身上真是合適：雅典從一個傳統和封閉的寡頭政體變成了一個「現代」和開放的民主政體，雅典人是出了名的活潑好動、充滿激情、熱愛冒險。

希臘世界內部的力量格局的變動必然引起新一輪的較量，斯巴達在陸地上稱雄，雅典在海洋上稱霸，修西底德記敘的這場戰爭實質上即是雅典和斯巴達為爭奪希臘霸權而展開的鬥爭。據修西底德說，「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然而，就像在人類有史以來進行的任何戰爭中一樣，戰爭雙方都互相指斥對方是不正義的，在斯巴達較雅典為甚，在弱小城邦較強大城邦為甚。科林斯人為了刺激斯巴達人奮起擔當「希臘世界的解放者」之角色，具體比較了雅典人和斯巴達人的不同性格，並向斯巴達人總結說：「一言以蔽之，他們是生成不能自己享受安寧的生活，也不讓別人享受安寧生活的。」在科林斯人看來，雅典正在試圖奴役整個希臘。然而，正在斯巴達辦事的雅典代表們在即席發言中並沒有聲辯雅典的行為是正義的。他們首先追述一番雅典人在希波戰爭中表現的勇敢、毅力和能力，然後說：「事務發展的實際過程迫使我們增加我們的實力，達到現在的程度：我們的主要目的是因為害怕波斯，雖然後來我們也考慮到我們自己的榮譽和利益。」雅典人似乎在說，雅典之所以成為一個帝國，是形勢所迫不得已罷了。但隨後他們又說：「弱者應當屈服於強者，這是一個普遍的法則。同時，我們也認為我們有統治的資格。」言下之意，既然雅典已經強大並成為一個帝國，那麼它就應該進行統治。

這種腔調的帝國辯護辭在另外兩個場合得到重複。首先，伯里克利在雅典人開始厭戰時說，帝國在自然本性上就像一個暴政，接受它被認為不正義，而放棄它又是危險的。仇恨只是暫時的，永遠保存在人們記憶之中的是當前的顯耀和將來的光榮。其次，在彌羅斯島對話中，雅典代表們甚至不想為雅典帝國或其侵略行徑的正義性做辯護。他們聲稱：「我們對於神祇的意念和對人們的認識都使我們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規律，就是在可能範圍以內擴張統治的勢力，這不是我們製造出來的規律；這個規律製造出來之後，我們也不是最早使用這個規律的人。」有力量者統治無力量者，此乃天經地義之事。至於彌羅斯人訴諸神祇和正義的「希望」，雅典人鄙夷道：「希望，那個危險中的安慰者！」，因為「希望本性上是一個要付出很高代價的商品。」希望不是實力弱小的彌羅斯人憑藉無辜而無用的言辭買得起的。但是，緊隨光耀千古的伯里克利葬禮演說之後的乃是瀰漫雅典的瘟疫恐慌，霸道十足的雅典人在彌羅斯對話後迎來的卻是西西里遠征帶來的災難。這在結構安排上不啻為修西底德此書最值得注意的兩處，它們一前一後還形成了對照，似乎暗示：驕傲者必受其挫，狂妄者必遭其殃。雅典周圍的德爾菲神廟中的兩句箴言不愧是希臘智慧的結晶：「認識你自己！」「不可過分！」但這是否同樣意味著，雅典帝國主義實乃不義，並因此得到了命運和神靈的嚴厲懲罰？

這是理解修西底德的歷史撰述的關鍵之處。關於瘟疫，修西底德說，它在雅典爆發之前就已經存在很久了，最開始發源自埃及，然後向北非和西亞各個地區傳播。也就是說，瘟疫並非

神靈因為發怒而在突然之間降臨給雅典人的懲罰。至於西西里遠征，就更複雜了，修西底德竟然在八章之中花費兩章來描寫它，而且在它結束後不久，修西底德沒有把這場戰爭記述完整就歇筆了。值得一提的是，色諾芬的《希臘志》初看起來是接著修西底德的筆觸續寫的，《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史》記敘到前411年就停止了，而色諾芬「續寫」到前362年，但二者的差異還是明顯的。與《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史》的「有始無終」相較，《希臘志》更是「無始無終」，它以「從此之後」開始，也以「從此之後」結束。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據此解釋說：「按照色諾芬，人事永遠充斥了糾紛和混亂，我們所說的『歷史』無非就是一段或輕或重的混亂狀態，所以，史家的『歷史』在何處開始何處終結純粹是隨心所欲。『變態亦即常態』。……色諾芬這種混亂複混亂的『史觀』與修西底德迥然不同。在修西底德看來，史家史作的開端和終結是由諸如伯羅奔尼薩斯戰爭那樣偉大的變動的開端和終結所賦予的。修西底德史作的『整全性』模仿了那場戰爭的『整全性』。……兩位大史家的根本差別在於，在修西底德看來，在『歷史』的開端和『整全』的開端之間存在著直接的勾連；而這一勾連在色諾芬看來則是不存在的。」但無論如何，二者的書寫都呈現了「歷史」與「整全」之間的斷裂，二者共同的「無終」表明，「歷史」只是對「整全」的不完美模仿。但既然是對「整全」的模仿，修西底德的歷史書寫就應該擁有一個完整的結構，或者說，它是一出情節完整的歷史戲劇，而「西西里遠征」就是這出戲劇的高潮部分。修西底德在第七卷結尾也就是「西西里遠征」謝幕之時說：「這是這次戰爭中希臘人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照我看來，是希臘歷史中我們所知道的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對於勝利者說來，是最光輝的一次勝利；對於戰敗者說來，是最悲慘的一次失敗，因為他們是全軍覆滅；他們的痛苦是很大的，他們的毀滅，誠如俗話所說的，是整個的毀滅，海軍、陸軍——一切都毀滅了。」言語之間充溢的悲悽愴然之情實乃修西底德歷史書寫的基調。

如果把這場戰爭作為一出悲劇看待的話，「西西里遠征」作為悲劇的高潮且自成一個完整部分，無疑是「悲劇中的悲劇」。按照亞里斯多德的悲劇理論，任何悲劇的發生本質上都源於悲劇主角自身的過失，或者說是在強大命運之下的性格和行動缺陷。那麼，「西西里遠征」的悲劇主角是誰？它犯了甚麼錯失？這場戰爭自身在這兩方面與「西西里遠征」是否同一？

凡是讓人產生悲劇感的故事都讓人有「不該如此！」之歎，越多地讀修西底德的著作，就越少地感到雅典人的災難是罪有應得的。最後合上這部著作時的心理，可能不是滿足於正義得到了伸張，而是更可能感到悲哀。這一悲哀之情至少在很大程度上產生於這樣一種愈益加深的感覺，即雅典人的失敗並不是正義的勝利，相反，正義本身存在於戰爭的主要受害者之中。雅典的失敗並沒有使彌羅斯人得到拯救，勝利的斯巴達人變得至少與雅典人一樣富有侵略性。雅典人在希波戰爭中作為被侵略者成長為海上帝國，雅典的擴張引起的斯巴達人對雅典人的被迫開戰，種種弱小屬邦分別加盟雙方的戰爭，斯巴達的意外勝利及其同樣的武力壓制，似乎都出於命運性的力量。施特勞斯在《城邦與人》中解釋修西底德的史書時，置於文章正中的兩個標題是Dike和Ananke，正是強調正義與必然性之間的關係為修西底德的主題。戰爭之中，在你死我亡的極端情況下，正義是如此脆弱。這不僅反映在雅典帝國主義者的霸道言辭之中，更反映在幾乎所有參戰者在戰爭的表現之中。與之相比，雅典人似乎還是屬於較為正義的一方呢。

「真的，在戰爭之處，斯巴達人把所有他們在海上所俘虜的人，不管是雅典同盟國的人也好，中立國的人也好，全部當作敵人殺死了的。」修西底德稍微流露點情緒都是頗為難得的，卻禁不住感歎斯巴達人的殘忍無情。普拉提亞由於斯巴達對其所面臨的來自鄰邦底比斯的威脅漠不關心才被迫與雅典結盟，在被包圍之後，普拉提亞人向斯巴達人祈求到：「你們

應當使我們正義地感激你們，而不是讓他們非正義地感激你們；不要為著滿足別人的欲望而自己得著惡名。你們可以取我們的生命於俄頃之間，但是你們這種行動的惡名將永久不能被人忘記。」但斯巴達人還是屠殺了所有已經投降了的普拉提亞人，不是因為他們相信底比斯人對普拉提亞人的蠻橫譴責，而是，如修西底德所說，為了取悅於底比斯人，因為他們認為在當前的戰爭中底比斯人對他們是有利的。後來，為了換回三百來名戰俘，其中一百多人出身名門貴族，斯巴達同意簽訂了所謂的尼西阿斯和約，出賣了那些根據斯巴達領導人伯拉西達的慷慨允諾才起而反叛雅典的城邦。這不過兩個例子，說明了雅典代表在彌羅斯對斯巴達人的指責並非無稽之談：「在和他們自己以及和他們的政制有關的事務上斯巴達人是特別好的；談到他們和別人的關係，那個事情說起來話就長了，但是我們可以簡單明瞭地說，在我們所知道的人民中，斯巴達人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他們認為他們所愛做的就是光榮的，合乎他們利益的就是正義的。」許多城邦都參加了攻打和保衛西西里的戰鬥，但修西底德指出，所有這些城邦的行動一般並不是因為道義上的原則，或者種族上的聯繫，而是出於利益、需要或其他動機。

斯巴達之所以不可能成為一個帝國，根本上與它不具備一個帝國民族所需具備的性格有關。它在對外事務上的克制和謹慎，不是因為它愛好和平，本質上乃是因為它害怕內部大量奴隸的造反，但這本身仍是斯巴達性格的結果。科林斯人在比較雅典人和斯巴達人的性格後對斯巴達人說：「你們整個生活方式，和他們比較起來，是已經過時了的。在政治上，也和任何手藝上一樣，新的方法必須排斥舊的方法。當一個城邦能夠在和平和安寧中存在的話，無疑地，舊式的方法是好的；但是當一個城市經常遇著一些新的問題的時候，它必須用一個新的方式去理解這些問題。因此，有各種各樣經驗的雅典，和你們比較起來，是一個遠為現代化的國家。」這場戰爭中最具天才的人物亞西比德道破了帝國統治的嶄新技藝：「這就是我們取得我們的帝國的方法，這就是所有的帝國取得的方法——勇敢地援助一切請求援助的人，不管他們是希臘人也好，非希臘人也好。如果人人不肯行動起來，或者援助的時候有種族的區別，那麼，我們就很少能夠擴張我們的帝國，更可能將有完全失掉我們的帝國的危險。」也就是說，與斯巴達不同，雅典抱負的無限性使其在對外事務中能夠超越單純利益的計較，並願意為實現最偉大的目標而不怕犧牲，這恰恰證明了伯里克利所謂雅典不單純計較私利的崇高優越性。在鎮壓密提林人的反叛之後，雅典人在憤怒情緒下想要處死全部男性居民，把婦女和未成年男女都變成奴隸，毀滅整個城邦，而非僅僅懲罰應該對反叛負責的人。但他們在情緒冷靜下來後，便把這個問題拿到公民大會上重新討論。最終，雅典人表現出寬容大度的品格，一國人民如此，這在戰爭期間是絕無僅有的事例。

但雅典人表現自己高尚情操的最輝煌事例卻同時是雅典人最不節制的事例，即西西里遠征。「每個人都充滿了遠征的熱情。年老一點的人認為他們將征服那些他們將航行的地方，或者，有了這樣大的軍隊，他們至少不會遭到災禍了；年輕一點的人希望看看遠地的風光和取得一些經驗，他們相信他們會安全地回來的；一般民眾和普通士兵希望自己暫時得到薪給和擴大帝國使他們將來可以取得永久的薪給工作。」幾乎所有的雅典人都被一股伯里克利曾經呼籲過的強大愛欲和熱情所虜獲，但是修西底德認為它們是過度的，和他們當時擁有的資源比較，他們對於將來所抱的希望也是過於遠大的。伯里克利說過，如果雅典等待時機，並且注意它的海軍，在戰爭中不再繼續擴張帝國的領土，也不使雅典自身陷入危險境界，那麼雅典將會在戰爭中取得勝利的。雅典人似乎忘記了自己對彌羅斯人的嘲弄「希望，那個危險中的安慰者！」，與其相比，雅典人對於帝國征服所抱的不切實際的夢幻式希望，更像是一個蠢惑和迷亂人心的美麗女人，那個把最後的惡留在盒子裏的潘朵拉。修西底德說，事先沒有人相信雅典人會如此固執。但即便西西里遠征失敗了，雅典人仍舊不失其為偉大。修西底德

不動聲色地表達了自己的敬重：「他們大部分的艦隊和其他軍隊在西西里喪失之後，雅典內部已經發生革命，但是他們還支持了八年，以對抗他們原來的敵人（這些敵人已經有了西西里人的增援）；對抗他們自己的同盟國（它們大部分已經暴動）；對抗波斯王子居魯士（他後來幫助伯羅奔尼薩斯方面，以金錢供給伯羅奔尼薩斯人建造艦隊）。」伯里克利所言不虛：「我們是自願地以輕鬆的情緒來應付危險，而不是以艱苦的訓練；我們的勇敢是從我們的生活方式中自然產生的，而不是國家法律強迫的；我認為這些是我們的優點。我們不花費時間來訓練自己忍受那些尚未到來的痛苦；但是當我們真的遇著痛苦的時候，我們表現我們自己正和那些經常受到嚴格訓練的人一樣勇敢。我認為這是我們的城邦值得崇拜的一點。」伯里克利的意思是，雅典人的美德乃是出於自然的天性，而非出於律法的教養。就偉大抱負和在逆境中堅忍不拔的精神而言，任何城邦都比不上雅典，西西里戰役及其後果突出表明了這一點。

但西西里遠征的失敗並非是被迫的、必然的、命中註定的，修西底德展示了他是一位深諳偶然性的偉大教師。在這些偶然性的紛亂線團出現之前，也就是在追悼伯里克利之時，他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西西里遠征的失誤不在判斷上，而在於國內的人沒有給予海外的軍隊以適當的支援。國內的人忙於個人陰謀，希圖獲得對人民的領導權，這讓遠征軍失掉了動力；他們的不合，也讓國家的政策發生紊亂。換言之，伯里克利葬禮演說中一再稱頌的雅典人的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和諧，也就是雅典人最值得驕傲之處，已經被其死後彌漫的私人野心和私人利益給破壞了。伯里克利時期，雖然雅典在名義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實上權力在第一公民手中。但是他的繼承人們，彼此都是平等的，而每個人都想居於首要地位，因此他們採取籠絡群眾的手段，結果使他們喪失對公共事務的實際領導權。本質上講，西西里遠征的失敗，乃是雅典過度民主制的悲劇，「雅典民主」乃是悲劇主角。但是，如果還是伯里克利繼續執政，他不會允許雅典人進行西西里遠征的，也就沒有最悲壯的帝國輝煌了。正如伯里克利死後的雅典民主已不同於前，年輕的亞西比德也不同於伯里克利。亞西比德的心中比伯里克利充滿更為巨大的愛欲，而這愛欲與雅典民主下的雅典人的愛欲本身是一致的，這是與伯里克利時期不同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一致」了。這種不同，也許就是人力無法左右的被迫性力量，也就是說，在「雅典民主」的背後還有一股它自身無法左右的力量催促著它走向毀滅。最終，在另一個不同意義上，「西西里遠征」的悲劇似乎就是無法避免的了。

伯里克利的葬禮演說，實際上通篇都以斯巴達為對比的參照對象。斯巴達乃是靠習傳律法維持的，並通過禮俗來培養公民德行；雅典人則拒絕從習俗意義上來理解神聖律法；伯里克利的演說吹噓雅典人無需一個荷馬，這似乎與修西底德自己詆毀《伊利亞特》完全一致。也就是說，「現代」雅典人把自己的生活理解為是發乎本性、合乎自然的。普魯塔克的論斷無比驚人：雅典的存在是有違神法的！當代古典學者伯納德特說，荷馬生活在特洛伊戰爭之後很久的年代，他的誇大部分是由於他對過去的無知，部分也是由於他必須彰顯某些本身不清楚的東西；而修西底德記敘的伯羅奔尼薩斯戰爭是希臘的頂峰，不同於以往的所有戰爭，它不需要任何不在行動自身之中的解釋。這是史實第一次為自己說話，尤其因為它們的記載者是這些史實的同時代人，不必依賴任何推測。它意味著自我彰顯，奧林匹克競賽中的赤身裸體就是其象徵。無疑，雅典人的西西里遠征就是其帝國愛欲的自我彰顯，而最懂得這種愛欲、最具有這種自我彰顯本性的雅典人就是亞西比德。如果說伯里克利還是一個持守中道的雅典人，一個最為卓越的政治家，那麼亞西比德最大的特點就是不節制；但如果說亞西比德把雅典人的精神發揮到極致的話，那麼伯里克利在天才稟賦上未必勝得過他。堪與他相比的，可能只有地米斯托克利了，而他們的結局似乎也頗為相似。

最不像雅典人的兩個雅典人是克里昂和尼西阿斯。克里昂擁有斯巴達式的冷酷殘暴性格，就是他力主雅典人處殺密提林全體男性公民，多虧了一個叫戴奧多都斯的人出言反對他才沒有得逞。克里昂給人印象最深的還有他性格的醜陋，他之所以是最為強勁的主戰派，不是因為甚麼高尚的原因，而是為了借用戰爭來掩飾自己的醜陋。因此，在修西底德筆下，他幾乎是獨一無二具有喜劇形象的人物。當修西底德一筆帶過他的死亡時，我們沒有感到可惜和悲傷，他帶給人的感覺除了一些厭惡之外，就是滑稽好笑。雖然這樣一個傢伙作起惡來也毫不含糊，但是雅典人早已把他的自負和大嗓門作為一個很開心的笑話了。最糟糕的是，莊嚴氣氛在他講演時蕩然無存，他高聲大叫，脫下長袍，拍著大腿，一面說一面亂跑。他對禮儀的蔑視和輕浮的舉止，感染了那些制定國家政策的人，很快就把整個城邦搞得一片混亂。

克里昂當時最大的對手是尼西阿斯。尼西阿斯是伯里克利之後的雅典頭號領袖，他在擺脫掉克里昂之後又迎來了亞西比德，他們實在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很多好的藥材，但也有不少致命的藥草摻雜其間。」普魯塔克借用《奧德賽》中的詩句來比喻亞西比德的天性，說其中同時並存向善和向惡的兩種強烈傾向。而亞里斯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說，雅典有三個最優秀的公民，他們對人民懷有一種世代相傳的善良願望和友誼，其中名列第一位的就是尼西阿斯。修西底德在他死後發表了一句墓誌銘式的評論：「他是最不該遭到這麼悲慘的結局的，因為他是終身致力於道德的研究和實踐的。」尼西阿斯在史書中佔據特別重要的地位，修西底德在敘述了他的七次行動之後才讓他第一次發言，這是絕無僅有的。尼西阿斯是整個西西里遠征事件中值得引起我們最深遠思考的人物，不僅因為他的戲分最多，更因為通過他，修西底德讓我們看到了許多人世間的重要道理。施特勞斯說，正如同評價斯巴達人一樣，修西底德評價尼西阿斯時也是從對方的角度作出的，他的評論是精確的，但並非全面的。修西底德說斯巴達在取得繁榮之時仍保持節制是無與倫比的時，並沒有指出其節制及其真實性格的原因；同樣，他對尼西阿斯的評論並沒有揭示出，人的德行與其命運之間關聯的真正意味。也就是說，在對具體人物或事件的評論上，修西底德從來都是有所保留的；只有從整體來看，才可能把握修西底德的全面教誨。與雅典人的遠征同時，修西底德也在暗裏進行著自己的遠征，他不多說任何不該說的話，讓人事自行展示自己。真理盡在其中，但一旦你沾沾自喜，自以為得到了寶貝，就會發現修西底德又已經走遠了。修西底德是與亞西比德一樣合乎自然的雅典人，但他同樣擁有伯里克利式的政治美德，把它用於自己的書寫之中，因此，他只能從習傳美德的角度說，尼西阿斯是個好人，他實在不該死。

尼西阿斯與克里昂一樣，是對斯巴達的拙劣模仿。克里昂呼籲雅典人像斯巴達人一樣對法律無保留地服從，以使雅典人消滅密提林人的決心更加堅決；尼西阿斯則依靠一種隱蔽的斯巴達「神學」，以說服雅典人和他自己相信仍有改變命運的可能性。然而，正如修西底德所特別指出的，斯巴達的軍事訓練「不是為了神」。與懷抱不切實際的遠大希望的雅典人相比，尼西阿斯是最不會希望的人，對他來講，或許最值得切實關心的是他的犯了腎病的肉體和財源滾滾的銀礦。他開始並不贊同遠征，但他試圖勸說雅典人放棄的演說反而堅定了他們的信心，使遠征因為多派了更多人而損失更大。他本來不應該出任將軍之職的，但他還是接受了。他到達敘拉古本應該馬上進攻，亞西比德就主張速戰速決，但他竟像旅遊觀光一樣繞西西里島航行，不僅延誤了時間，更摧殘了軍心、挫傷了士氣，使敘拉古人對雅典遠征軍的態度由恐懼轉為輕蔑。他的拖延緩慢似乎不可救藥，他的優柔寡斷近於愚蠢，雖然也有些小小的勝利，但他不認為來自於軍事上的考慮和士兵們的功勞，而只有感謝神靈。一旦行軍打仗順利無虞，他就認為是神的幫助，就像他的銀礦發了財要祭拜神靈一樣大展虔誠，這個時候他行動起來似乎還像回事兒。可是困難出現，他立馬轉變態度，剩下的只是病態的孱弱和老態的謹慎，似乎海上行軍千里只是去為了等待敵人的進攻。他還生活在古老的陸地時代，海

洋帝國的風範他難以沾邊，渾不知海軍的最大優勢就在於機動、靈活、富有成效的進攻，這在雅典人已成常識。等到雅典海軍的優勢喪失殆盡，連統領援軍的德謨斯提尼都無能為力、主張返航時，尼西阿斯卻寧願死在敵人手裏，也不願死在雅典人手裏，因為他素知雅典人習性，害怕因領導無方而遭受放逐或被處死刑。這使那麼多雅典人陪著他的「自私」一起死亡。要是他們趕快跑，或許損失不會如此慘重，但僅僅是月食就又把雅典人擱置下了，因為尼西阿斯過於相信占卜之類。一個將軍竟然如此迷信，可謂空前絕後，叫人笑掉大牙。在逃路無方、陷入內陸的災難後，尼西阿斯竟然變成了一個所有人中最會希望的人，並試圖用此希望來鼓舞士氣，但它如此沒有根基、如此空洞虛幻，是純粹彌羅斯式的，說是「祈禱」或許更為恰當。尼西亞斯置身戰場似乎更像在祭神壇之前。但這是無濟於事的，在對雅典人於毀滅之時遭遇的巨大痛苦的描繪中，修西底德展示了他最為悲憫的史家情懷。通過西西里遠征中的尼西阿斯，修西底德深刻表明了一個道理：習傳美德不同於一般美德，經不起西西里遠征這一極端特殊情況的考驗。習傳美德是靠不住的東西，因為它依賴於「希望」，並部分地被這些希望所引導，而這些希望除了對習傳美德自身的信仰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的基礎。尼西阿斯對習傳美德保持無比忠誠的最終目的，是希望確保他的安全或聲望。對個人安全的盲目希望，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他個人的死亡及其城邦的災難。

或許尼西阿斯是無辜的，但他作為一個虔誠的人與作為一個出色將軍之間的矛盾卻昭昭無遺。他對神的虔誠要遠遠高於一般雅典人，他本不應該參與這一愛欲勃勃的遠征行動，因為與他的天性太過不符。如果亞西比德不被召回受審，西西里遠征仍有勝利之望，再也找不到展示他的卓越天性的更好機會了。但他偏偏不能在這場愛欲行動中發揮自己的才華，而他最可能被控的罪名又偏偏是瀆神。不夠虔誠的雅典人控訴亞西比德不虔誠，這看似一個悖論式玩笑，卻是最悲哀不過。在一個充滿轉折和變革的時代，人民已經對習傳禮俗不再抱有虔誠而堅定的信念，但他們還是生活在其流風餘韻之中，容不得過度的越軌之人，尤其是看起來天性長滿毒草的天才人物；但他們自己無時無刻不在破壞著傳統美德本身，日益走向敗壞而不自知，反而嘲笑真正由習俗養成美德之人迂腐、僵化、頑固，仿佛自己才是最現代的文明人似的。第一次和最後一次遭遇這種情形的肯定都不是雅典人，但雅典人確實遭遇了這種情形。他們在紛亂迷惘的時代中也許根本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些甚麼，連智慧的蘇格拉底拿他們都沒有辦法，只好在被判死刑後為自己申辯時無奈地說：「我去死，你們活，誰的選擇好，唯有神知道。」然而，令蘇格拉底充滿愛欲的亞西比德卻逃過了一死，至少不像蘇格拉底一樣死在雅典人手裏，當然，蘇格拉底的正義或者不如說溫順也不是他所能比的。但講到亞西比德被召回國時，修西底德插入了一段關於僭主和愛欲的敘事，這實在大有意味。

雅典人很久以來就對僭主統治懷有病態的恐懼，總是對他們懷有最大的不信任。然而，修西底德通過講述阿利斯托齋吞和哈摩狄阿斯刺殺僭主的勇敢行為，試圖證明，「雅典人也和其他的人民一樣，對於他們自己的僭主和他們自己的歷史事實是沒有正確的知識的。這兩個人對僭主的怒火，一個因為愛情和嫉妒，一個因為尊嚴受到傷害，總之，不是源於甚麼公共利益，而是完全出自私己性的情感或者利益。事實上，修西底德曾在此書開篇的「希臘考古」部分說，僭主們總是考慮他們自己，他們個人的安全和他們自己家族的榮耀，因此他們的政府的主要政治原則是安全，沒有值得提及的成就。但他在這裏卻又表示，庇西斯特拉圖家族的僭主們長期以來的行為，表現了他們的政策有高度的原則和智慧，他們遵守各種習俗倫理，特別是宗教儀式。小庇西斯特拉圖對城邦和神靈就表現出有名的正義和虔誠，有銘文為證：「希比亞的兒子庇西斯特拉圖樹立這個職位紀念碑，在彼提昂的阿波羅神的聖地上。」阿利斯托齋吞和哈摩狄阿斯的愛欲行為本身是對神聖律法的違背，其憤怒和陰謀乃為了私人利益而破壞了公共利益，但此事發生以後，僭主統治對雅典人就是更難以忍受的壓迫了，因

為僭主們確實也更加開始害怕了，更加顧慮私人安全而非城邦正義了。伯里克利大力讚頌的雅典生活方式的優越性，其實很少是現實，除了正義和必然之間的二元性外，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的二元性也是修西底德有意通過敘述展示出的。

倘若西西里遠征在亞西比德的指揮下獲得成功，他確實很可能成為僭主，但這是雅典民主本身應該接受的冒險代價，它也是來自必然性的強迫而已。但雅典人對亞西比德的指控看似虔誠，實際乃是出於私己利益的考慮，隱藏在對赫爾墨斯神像破壞的粗暴反應背後的，乃是對亞西比德成為僭主的恐懼。他們希望西西里遠征為帝國帶來榮耀，其中也是暗含著更多的個人考慮。帝國本身在性格上就像個僭主，但雅典人卻既害怕帝國擴張可能帶來的僭主統治，又要追求光耀千古的帝國事業，正是個人利益的考慮使其自相矛盾，他們的各種欲望向來互相撕咬。亞西比德自身的天分無可懷疑，但他最大的失誤乃是沒有去試圖讓民眾理解自己，他演說中的飛揚跋扈和不可一世形象實在鮮明極了。但考慮到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又何曾試圖讓民眾理解自己，他的這項過失也就可以原諒了。其實，在亞西比德和民眾之間還有一群人，正是他們試圖破壞亞西比德和民眾可能建立的良好關係，他們就是為數不少的煽動蟲惑家，亞西比德的敵人。他們對雅典領導權的個人野心使其無比嫉妒亞西比德，非要置之於死地不可。他們關心自己的利益大大強於城邦的利益，他們把城邦內部搞得亂七八糟，卻不關心西西里遠征的雅典軍隊的死活。這些人中肯定有一些來自過時的老派寡頭統治者，他們想在民主制下老而不死、死而不僵，當然還有民主制下新生的不少天賦平庸卻欲望強烈的傢伙，他們最拿手的就是迎合民眾欲望，進而擾亂人心。就像尼西亞斯最為關心的是自己的肉體、財產和虛榮一樣，雅典已經不是伯里克利的雅典。

此外，即便是亞西比德，對甚麼是雅典城邦的公共利益的判斷也可能發生失誤，否則他那與雅典民眾的愛欲一致的愛欲為何不得揮發？這正如雅典民眾對甚麼是自己的私人利益判斷失誤一樣。亞西比德的任性胡為，使他自己並沒有成為他所謂的三種類型人中最優秀的深思熟慮者，至少不夠；他更多的是隨時隨處都可應景施展的陰謀詭計，他實在是極其狡猾的，但這並非最高明的智慧。那麼，修西底德筆下最智慧、最具有判斷力的人物是誰呢？這就是在全書中僅僅出現過一次的戴奧多都斯。他看起來不像是政治家，但對雅典政治生活唯一的一次介入卻表現得相當純熟。他成功地說服了雅典人以相當人道的態度對待一個附屬盟邦，從而維護了雅典帝國。他的講演文雅優美，在修西底德著作中洵為罕見，似乎反映了修西底德本人的特點。

雅典人及其偉大領袖都希望締造不朽的帝國榮耀，但既然自以為高尚，就不能無顧比如彌羅斯人的譴責，欲加統治，就要為自己辯護。雅典人的理由是利益，或者自私本性。但既自認高尚，雅典人的帝國愛欲必然遭受的風險和犧牲，就是為取得帝國榮耀值得付出的代價。雅典人是如此認為的，這就與他們出於利益的辯護相矛盾。自私本性沒有為超出自身利益的崇高、優越事物留餘地。受帝國愛欲驅使的西西里遠征，從一開始就是與純粹的利益算計不符合的。因此，雅典人的最後觀點應該是：沒有超越自身利益的高尚。

克里昂相信強力，試圖說服雅典人完全服從法律的決定，而稱那些自以為比法律聰明的人，不是因為虛榮，就是因為受賄，總之，源於牽涉自身的利害關係。他的發言一大堆，其實沒有甚麼實質內容，在討好雅典民眾和掩飾自己卑劣之時，目的無非就是要毀滅密提林人。戴奧多圖斯的發言必須首先使雅典人相信他的發言不是出於個人利害關係，否則肯定不能贏得成功，因為他深諳雅典民主政體必定懷疑發言者的個人動機，克里昂就是利用了這一點進行攻擊。他首先為城邦的三思而後行辯護，直接羞辱克里昂，並說對發言者的任意懷疑只能促使公民不願真誠說出自己的良好意見，只有坦率忠言才對城邦最為有益。但是，他接著坦率

地說，在雅典，沒有人能夠公開地做一件好事而不需要耍弄欺騙手段的，公開的愛國行為反而容易被懷疑為圖謀私利。這是戴奧多圖斯深諳雅典性格的直言，他告訴雅典人他要欺騙他們。因此，他聲稱不考慮正義問題，而只是考慮利益問題。但他巧妙地提到人的天性問題，說人天性就有越軌違法傾向，任何法律或懲罰的威脅都無法禁止。「希望和貪欲到處都有；貪欲在前，希望跟著來；貪欲產生計劃，希望暗示計劃可以成功。」迫於自然的情欲，我們身不由己地去追求最強烈欲望著的物件，所抱的希望無論多麼愚蠢都是被迫而非有意的。正是通過闡明越軌的不可避免性，他啟發了雅典人的寬容心，重新喚醒甚至加深了他們的溫和情緒，以此讓雅典人接受：殺死大多數密提林人是不正義的。直接說正義與雅典人自身的利益一致是不明智的。克里昂已經喚起憤怒情緒，說屠殺不正義更會使他們懷疑，不是從雅典利益而是從個人利益出發，他只是假正義或人道之名而行出賣城邦之實。城邦如此不信任發言者，戴奧多都斯就必須首先盡力贏得信任，只好假裝對正義不關心了。

但戴奧多都斯走得更遠。他還騙取我們相信了他隱微的關心乃是對正義的關心。既然說越軌乃人的天性，法或正義就不是主要考慮的問題了，即使有時恪守正義是有用的。他明確把雅典為帝國辯護的觀點用於個人，所有其他講演者都沒有做過，從而表明他關心的是甚麼。他明確指出，利益的至上性實際上是有別於城邦利益的個人利益的至上性。正如沒有比利益更重要的一樣，對個人也不存在重於其自身利益的東西。由此可見，雅典人懷疑發言者主要被其個人動機驅使，是有充分根據的，戴奧多都斯本人就證明了這一點。最終，他最為真實的意思乃是，他不認為關心城邦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才被迫說謊，只是他沒有說出這種不同於城邦利益的個人利益是甚麼。但既然他對城邦事業採取批評態度，他就不大可能僅僅滿足於政治生活帶來的獎賞，他並不把對他人的統治及其成果看作個人的最終利益。他掩飾了關於個人利益的積極思想，緘口不談甚麼是對個人而言最好的生活方式，這一點正與修西底德相同。

修西底德書中唯一一次提到哲學，是在伯里克利的葬禮演說讚美雅典人對「美和智慧」的熱愛時，但伯里克利要說的是雅典人對政治生活的積極參與：「就是那些最忙於他們自己的事務的人，對於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這是我們的特點：一個不關心政治的人，我們不說他是一個注意自己事務的人，而說他根本沒有事務。」但是伯里克利不了解哲學思考本身的弱點，被對哲學的特殊愛欲驅迫而行的人，除了獻身於對政治和道德問題的嚴肅思考，還會從此出發考察和探究各種信念的真理性問題，從而最後轉向把哲學思考作為他們的最終利益。修西底德所具備的精神力量肯定使他成為一個能夠接受這種精神驅迫的人。蘇格拉底從「哲學」到「政治哲學」的轉向乃是「第二次起航」，修西底德的「歷史」中包含的「政治哲學」思考則是他個人的「西西里遠征」。在敘述雅典人在帝國愛欲的驅使下進行的西西里遠征及其痛苦結局時，修西底德最大程度地展示了政治生活內在的局限性及其固有的悲劇性格，從而完成了他在個人對「探究真理」的愛欲催促下完成的「愛智」的「西西里遠征」。正因為如此，不管他敘述的政治生活是崇高偉大的還是恐怖醜陋的，是激動人心的還是令人愴然的，他的文筆中充盈的氣息和語調，都是寧靜而明晰的，公允而仁慈的。

修西底德本人也是雅典這塊土壤才能結出的甜蜜果實，只有雅典才為人的獨特個性和才能的發展提供了最好的舞臺，只有雅典才顯示了科學和藝術的繁榮昌盛，為人類的精神領域貢獻了那麼多的天才人物和作品。西西里遠征中被囚的雅典戰俘，有一些竟然靠背誦歐裏庇得斯的詩句而得以存生，敘拉古人是如此熱愛雅典的這位詩人，而雅典人是如此感激詩人的救命之恩。因此，伯里克利所說的「雅典是全希臘的學校」，所言不虛。敘拉古的赫摩克拉底乃是當時極少數配得上做亞西比德對手的人物，他對此理解得就頗為深刻。敘拉古人的海上勝

利，固然是雅典的失敗，但卻是雅典精神的勝利。傳統的城邦比如斯巴達的教育乃是畜群的教育，斯巴達的性格就是整齊劃一，它整個城邦顯示的德行要遠遠超過具體個人。我們總是籠統地說斯巴達人如何如何，但很少記得起幾個天才的斯巴達人的名字。修西底德的書中提到的斯巴達人的演說辭也極少，這固然與他們出了名的沉默寡言有關，但也與他們實在沒有甚麼卓越的才能好在公共舞臺展示有關。波桑尼阿斯乃是與地米斯托克利同時並稱希臘世界的人物，但他被斯巴達人同胞視為模仿外國生活方式，不尊重傳統禮俗。修西底德筆下唯一展示了巨大個人天才的斯巴達人就是伯拉西達，他是克里昂的戰場對頭。但克里昂是借用戰爭來掩飾自己的醜惡，伯拉西達乃是借用戰爭來展示自己的卓越；克里昂性格上更近於斯巴達人，伯拉西達則像個雅典人。事實上也是如此，修西底德在流亡期間就與伯拉西達成為了好朋友，伯拉西達是他最不吝筆墨給予讚美的斯巴達人。

但世上有多少人能夠像地米斯托克利或者亞西比德那樣，無論在哪裏都能無拘無束地展示自己的偉大天才呢？最為出色的雅典人不是很可能被自己的城邦給放逐或者判處死刑嗎？城邦與人不是完全等同的。修西底德的帝國考古中的一個主題是希臘的蠻族起源，而整部著作的另一個主題則是希臘的重新野蠻化。深切體味希臘神聖精神的伯納德特說：「無論一樣東西、一個地方、一種習俗還是一種獻技，只要是莊嚴神聖的，就是諸神的擔保，人將因此永遠不會完全受必然性左右。人們將永遠不必把留給神的東西拿來給自己用，或者忽視本應由神做的事情。」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卻正是必然性的顯示。比如科西拉內戰爆發的一個跡象，就是把莊嚴神聖的事情扭曲為派別利益。對野蠻性的限制，也就是通常所理解的人性，不是依賴於自然，而是依賴於一種具體的虔誠，即對神性的具體理解。因此，莊嚴神聖的事情並非最好不要有的野蠻族群的習俗殘餘。希臘不等於地米斯托克利式的天才人物，莊嚴神聖的事情乃是希臘自身力量不可替代的源泉。因此，雅典帝國愛欲的普遍精神與它自身的基礎相衝突，便是至關重要的因素了。拋棄莊嚴神聖的事情，並沒有像伯里克利相信的那樣，引向對公共的利益和善好的完全關注；相反，它引向了對個人的強迫、控制和奴役。無論希臘人所分享的對美的愛到何種誰也不清楚的程度，這種對美的愛都與法律不可分割，它是神聖而美好的。

西元前424年，三十歲出頭的修西底德當選為雅典將軍。西元前424—423年間的那個冬季，伯拉西達襲擊安菲玻裏城的時候，他正指揮七條雅典戰艦駐紮在塔索斯。駐守安菲玻裏城的攸克利將軍求援於他，他駛往救援；雖然打敗了伯拉西達的軍隊，救了愛昂，但是他終於沒有來得及挽救安菲玻裏。安菲玻裏城的失陷，主要是由於攸克利的疏忽，但是他後來並沒有收到懲罰，而修西底德卻因此遭到放逐。修西底德對此事沒有做任何辯護。由於遭到放逐的罪名不是普通的疏忽職務之罪，而是叛逆罪，修西底德不能呆在雅典勢力範圍內的任何一個地方，否則就有被逮捕的危險。他的一部分時間在色雷斯度過，他在那裏編寫他的歷史著作，還與原來的敵手伯拉西達成為了好朋友。他對伯拉西達的推崇僅次於伯里克利。他在伯羅奔尼薩斯各地遊蕩，並親自航行到了西西里。直到西元前404年以後不久，他才在度過二十年的流亡歲月後回到雅典。他的晚年有一部分也是在色雷斯度過的，很可能也死在色雷斯，不到六十歲。

修西底德勿庸置疑是一個好公民，他從不因為雅典對自己的不公而喪失對它的熱愛，他在著作中表現出的愛國熱情有目共睹。他當然也毫不猶豫地批評過雅典，但那同樣源於熱愛，何況他的批評是公允而慈悲的。對於修西底德的流亡生涯的具體情況，我們不得而知，但他朝向未知世界以探究真理的航行，我們卻有幸一睹風貌。在這次大膽的航行中，修西底德發現的真理就是：人沒有能力發現真理。換言之，人無往不在希望之中。他的歷史書寫以波斯將

軍替薩斐尼在希臘邊城以弗所祭獻希臘女神阿提密斯而突然終結。他在篇首聲稱這場戰爭的偉大體現在它波及了「希臘人」和「野蠻人」，那麼，這個不是結尾的結尾或許表達了雅典的公民、希臘的兒子修西底德的光榮夢想或者說「希望」：「野蠻」被「文明」所歸化。但正如修西底德的智慧誕生於絕望中的冷靜，他的希望只是表達了他的虔誠。即便歷史的實際進程未必如此，雅典文明反而淪於野蠻化的境地，但他仍值得稱道。施特勞斯在《城與人》中談論修西底德時，以「甚麼是神？」的問題終結，另外還有專文論述修西底德著作中的神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或許才是修西底德最後的教益。「神」正存在於「歷史」之中，修西底德正是看得清希臘民族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智慧之人，他的「西西里遠征」是對城邦充滿虔誠和熱愛的。

參閱著作

（古希臘）修西底德：《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史》，謝德風譯，商務出版社，1960年。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The Complete Hobbes Translation, Chicago Uni. Press, 1989.

（古希臘）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上冊），〈地米斯托克利傳〉，〈伯里克利傳〉，〈尼西亞斯傳〉，商務出版社，1990年。

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Chapter III: On Thucydides'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 Chicago Uni. Press, 1964.

Leo Strauss, *Studies in 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Gods in Thucydides' Work, Chicago Uni. Press, 1983.

（美）列奧·施特勞斯、約瑟夫·克羅波西主編，李天然等譯，《政治哲學史》（上），〈第一章：修西底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劉小楓主編，《施特勞斯與古典政治哲學》，〈施特勞斯的《城邦與人》〉（伯納德特作），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

林國華：《詩歌與歷史：政治哲學的古典風格》，〈修西底德的帝國回憶〉和〈歷史指令哲學〉，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

林國榮：《君主之鑒》，〈為海戰聲辯〉，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

劉晨光 男，1981年生，現為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理論專業2004級碩士研究生，主要學術思想興趣在政治哲學與戲劇、歷史。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八期 2006年3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八期（2006年3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